

墨索里尼

MUSSOLINI

[澳]理查德·博斯沃思 / 著 李宏强 / 译

下 册



我渴求成为强
人——一个充满精
力、充满破坏力、毫
不犹豫地去惩罚打
击敌人以贯彻其坚
强意志的人。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

MUSSOLINI 目录

第 3 部·权力高峰

1 鼎盛时期的墨索里尼 ... 307

2 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 ... 337

3 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帝国 ... 368

4 欧洲的危机 ... 398

第 4 部·日暮穷途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 ... 435

2 纳粹德国的不光彩的帮凶 ... 466

3 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 ... 498

4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阴魂 ... 533

鼎盛时期的墨索里尼

与天主教会成功地达成和解协议似乎把墨索里尼推上了一个新的权力高峰。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了，当其他政治家们感觉生活中充满艰难并且前景暗淡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形象却在整个意大利以及国际上大放异彩。他继续运用耐心和技巧，与法西斯当政之前意大利几乎所有领域内的老精英们都达成了妥协。教皇和国王、工业家、银行家和地主、军队、警察和官僚、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包括极少数执意抵抗的异见分子，而且这些人大多数已经被赶到国外去了），所有这些人现在好像都很喜欢与墨索里尼合作了。当然，外国政府也是如此。在墨索里尼处于鼎盛时期的这几年里，这些外国政府的专家顾问们可能更多地是建议政府对意大利的模式进行研究。例如，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正因为无法抵抗大萧条对他们的社会的袭击而感到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此时，他们就愿意相信是法西斯主义事先为意大利接种了疫苗，从而使它能够抵御在其他国家到处发生的失业以及价格体系和生产的崩溃。《金融时报》的保罗·艾因齐格在1932年访问意大利之后深思道：“意大利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非常有纪律，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并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让普遍的合作远高于自私的思想。”他还敦促说，有必要对这个社团主义国家进行细致的研究，而墨索里尼享有的权威让人对他心怀敬畏。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大众心理学现象”。他最后总结说，领袖墨索里尼的“力量和政治才能”是不可限量的。

在图拉蒂任总书记期间，曾经焦躁不安的法西斯党也受到了约束，变乖了不少。但同时也要承认，那些主要的法西斯人物之间的争斗仍在无休止地进行着。正如墨索里尼用他那惯常的口气解释的那样，革命的麻烦就是那些革命者在革命完成之后还活着。但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记录下这些人之间的争斗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毕竟在当时，法西斯党内的主要人物都没有能力对墨索里尼的角色和感召力构

成竞争威胁。在法西斯政权内,除了无法与皇帝相比之外,墨索里尼看来已经拥有了一个统治者应当具有的所有权力。墨索里尼并没有效仿在阿尔巴尼亚自立为国王索古一世的艾哈迈德·索古,但他的确喜欢把自己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提并论。(一些民族主义评论家甚至声称,尽管拿破仑是一个科西嘉人,但他“的确”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些更加卑躬屈膝的传记作家们又补充说,不应当只拿一个皇帝来和墨索里尼相比,实际上,他是历史上所有杰出的皇帝的集大成者。*好像是要为这些评价指明方向一样,1928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还抽出时间与剧作家焦瓦基诺·福尔扎诺在一部有关拿破仑的剧作的内容方面进行了合作,并且同意这部剧作在意大利以外演出时可以声称他是剧本的合著者(这部剧作在布达佩斯的演出非常成功)。在这部福尔扎诺和墨索里尼合著的剧作中,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男子汉,他先知先觉,并且英勇无畏,但是仍然注定遭到了背叛:“在我死后,你们将会听到法国所有污秽的口舌都在诽谤我。那些被我成就了的人,那些被我变得伟大的人,那些被我从贫穷和悲惨境地中挽救出来的人——他们将毫无羞耻地损害我的名誉。”

如果这部剧作能够反映出当时墨索里尼内心的一些想法的话,那么可以说它表明墨索里尼内心的阴云并没有散去。然而,这些猜测还只能限于他的个人想法。当时为他拍摄的新闻短片显示,墨索里尼的表达和姿态都很活跃,并且总是面带微笑,看上去充满魅力,派头十足。同样,在1929年的时候,意大利人也是既高兴又平静,只有少数人对墨索里尼的独裁统



1924年12月,代表封建势力的索古攫取政权,次年成立共和国,自任总统。1928年索古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君主国,自称索古一世。1925~1939年在位

*这位作者声称,当他在1932年10月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咕哝道:“啊,恺撒大帝!”

——作者注

治是完全顺从的。宣传家们接到指示,要他们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但是,历史的分析显示,天主教、家庭、家乡和地区、“资助人-代理人”的关系网、对性的态度等许多其他的意大利旧的结构体系都分散了意大利平民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对法西斯主义抱有狂热的虔诚。虽然如此,特别是因为法西斯政权与教会达成了和解,在3月24日的大选中,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平静而恭敬地投票支持了法西斯政权和它的政策:超过850万人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只有13.5万人反对,弃权的只有8092人。

墨索里尼已经达到如此伟大而无人企及的地位,作为这一地位的一个象征,1929年9月16日,墨索里尼把他的办公室从基吉宫搬到了威尼斯宫里。在那里,他被安置在“复兴两半球厅”里,这是15世纪时为教皇修建的一座建筑,最近才被修复。它的房间非常大,长18米,宽15米,房顶高12米。在这样大的一个房间里,从办公室的门口到墨索里尼的办公桌(通常非常混乱)之间就有长长的一段距离,来访者即使是蹑手蹑脚地走过这段距离,房间里也会有很大的回音。这座宫殿的外面就是罗马的心脏地带:那里有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以及自由党时代的野心的伟大象征——维克托·伊曼纽尔纪念碑。很快,威尼斯宫上的阳台就成了墨索里尼发表最重要或者最平民化的演讲的地方。从那里还可以看得到罗马圆形大剧场,以及一条被命名为帝国大道的林荫大道穿过古典的广场一直通到大竞技场。虽然现在已是意大利第三帝国,但这里还回荡着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声音(一个自信和厚颜无耻的年轻法西斯分子通过了“松懈”的警卫走进了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他注意到,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墨索里尼在他的桌子上也摆着父母亲的照片,还有他自己拉小提琴的照片,他的房间的其他角



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办公

落里还装饰着他的“高贵的安哥拉猫”)。

路易沙·帕塞里尼评论说,第一批到墨索里尼这里来的拜访者的首要目的是确认他们的梦想。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墨索里尼可以激发起他们的梦想和恐惧。20世纪20年代的严峻的建筑风格能够体现出罗马共和国或者早期帝权的主题,而“两半球之厅”的设计风格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受到胁迫而产生敬畏的感觉,用一种拜占廷式的风格把独裁者与他的统治目标隔离开来。从一个科里奥兰纳斯*,一个提比略·格拉古*,或者一个尤利乌斯·恺撒,墨索里尼已经被转变成了一个类似君士坦丁或者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人,一个半神化的人,他的光辉足以让普通人中那些矮小的小偷们感到头晕目眩。为了显示这种至高无尚的地位,用来形容墨索里尼的感召力的语言也改变了方向。转而重点强调领袖是孤独的,而且必须继续孤独下去。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有时也抱怨过他的孤独。在30年代里,孤独已经成为或者据称已经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1932年4月,他对一位崇拜者说:

“一个人必须接受孤独……一个领袖不能有与之地位平等的人,也不能有朋友。从自信的交流而得来的谦卑的安慰是在否定他自己。他不能敞开他的心扉,永远都不能。”

当时,墨索里尼故意摆谱似地拒绝到法西斯政权的一些部长家里去访问,社会交际不属于他这样的人的行为。无数的照片把他新的“花岗岩似的”形象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的新的形象已经无处不在了:严厉而没有任何笑容,薄嘴唇,剃了光头,很可能还带着一个

* 科里奥兰纳斯,莎士比亚所著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人物。

——译者注

** 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公元前132),古罗马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与其弟弟盖约·森普罗纽·格拉古(公元前153~公元前121)合称“格拉古兄弟”。他寻求通过土地的大规模再划分来帮助贫穷的农民,遭到豪门贵族的反对,在选举保民官的公民大会上被打死。盖约接替其兄的工作,发动了几次改革,但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译者注



军用头盔。毫无疑问，他带帽子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头上留下的一些头发正在变白），但是现在，墨索里尼这个像大理石一样冷酷或者坚强如刚的战士，这个人类中的机器的形象，取代了他过去更为细腻的形象。

那么，从签署《拉特兰协议》那令人高兴的几年到纪念进军罗马10周年期间，墨索里尼是否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呢？他现在是一个面前没有任何重大的反对和阻碍的无拘无束的独裁者吗？一个可以独自描绘意大利的前途和命运、甚至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人吗？



墨索里尼严厉的面容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意大利，所有的事情真的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在按照领导决策层的意愿发展吗？法西斯主义真的像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了“一个完美而坚实的极权主义体系的所有的特征”了吗？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总是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情。1927年，一份警方的报告声称，阿尔多·卢西尼奥利曾对他的朋友抱怨说，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警察简直无处不在。他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之多超过了意大利复兴时期以前“波旁王室或者奥地利人的肮脏记录”。卢西尼奥利问道：“但是，他们的这种镇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墨索里尼以前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根除法西斯分子中的暴力活动和腐败行为的，不至于再因此而遭受批评并陷入难堪的境地。卢西尼奥利说：“但是，鉴于他的心理和他对于比他更强的人那种天生的害怕，我现在不相信，并且永远也不会相信尊敬的墨索里尼会清除他的那些朋友，这些人神化墨索里尼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摇摇欲坠的大厦。”1930年10月，图拉蒂突然被解除了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盛传他是个同性恋，并且有恋童癖（与他具有斯巴达

式的高尚情操的官方形象不符)。*现在回顾起来,应当是确有此事。1945年以后,他写文章回忆说,领袖是“对他自己的缺点心怀恐慌”。他还说,这一事件解决之后,墨索里尼看起来平静多了。在被自己的下属控制的过程中,墨索里尼总是心怀恐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现在,他可以更好地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慌隐藏起来了。图利奥·恰内蒂是一个来自翁布里亚的法西斯分子,也是一个法西斯工会运动的狂热分子,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注意到了墨索里尼每次演讲所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效果,只有在这种兴高采烈减退之后,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怎样才能让这些大肆宣扬的政策得以贯彻?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所以只能引用一句口号了:“墨索里尼的渐进主义”——这是用礼貌的语言描述在浮夸的言辞之下隐藏的真实的停滞不前的状况。

卢西尼奥利、图拉蒂和恰内蒂的话引起了一些有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人们为其他独裁统治编写历史时也曾出现过。领袖怎样统治国家?如果存在局限性,那么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局限性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不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法西斯政权的一些典型特征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不是像法西斯政权大肆宣传的那样,是墨索里尼掌控着意大利?还是意大利掌控着他?

外交事务也许可以拿来对此做出衡量。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起,墨索里尼就通过夸耀自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而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他希望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渴望。同样,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评论家们都急于谈

*墨索里尼喜欢对一些特定的听众说图拉蒂是清白的,那些谣言都是法里纳奇故意编造的,但是墨索里尼既没有出面挽救这位以前的同僚,也没有再给他在政府中任职的机会。

——作者注

麦格雷戈·诺克斯，历史学家。主要研究1890—1945年间的欧洲国际政策方面以及欧洲战略方面的历史；德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意大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以及意大利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

* 凯洛格，美国国务卿（1925—1929），倡议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年），得到62个国家认可，公约否认了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工具。他因此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从1909年起11次连任总理。任外交部长时是《洛迦诺条约》的主要筹划者（1925年），这一条约保证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和平。他也参与起草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并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

——译者注

论“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战争”。在当今的历史学家中，麦格雷戈·诺克斯就特别热切地把“领袖”一词和纳粹德国的“元首”联系起来，他认为二者有着天生的“共同命运”。在他看来，用现在说法，这二人都是“流氓国家”的领导人。另外，在诺克斯看来，在1926年的时候，墨索里尼的侵略计划的“所有主要的细节都已经确定了”，或者时间甚至会更早一些。他认为：“从一开始，墨索里尼的计划的本质就是战争，一次伟大的战争。”

其他历史学家倒是没那么自信。恩尼奥·迪诺尔福就精明地评论说，墨索里尼“支持修订凡尔赛条约，但并不是真心希望修订”。同样，同时代的人对此问题也并不确定。经常与墨索里尼打交道的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就评论说：“我非常怀疑墨索里尼自己是否确切地知道他所希望的意、法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墨索里尼在国内到处发表炫耀武力的演讲，而在外交场合的行为举止却理性得多。墨索里尼虽然满嘴花言巧语，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却往国际联盟的许多委员会都派遣了忠实的代表，相反，这些被任命的意大利代表并没有被他们的同事们认为是被意识形态的狂热所控制的人。1928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甚至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但是，在下议院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在谈到这一公约时说它是“那么崇高，应当称它是超自然的”，从而引发了听众们会心的大笑。同样，在这一公约还在谈判的时候他就声称，单方面拒绝这一公约是毫无道理的。

尝试用这样或那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也是

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怎么样来理解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不一致呢？拿人的问题来说吧，如果是面对外交部的人而不是军队或者警察，那么墨索里尼的行为就会表现得更加激进。例如，1926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开始宣称这一年是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仑年”。他承诺说：“从今天开始，意大利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以适应它已经增长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国力。”9月份，他还真的让孔塔里尼从外交部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休了。^{*}并且，他还惟恐继任者再像孔塔里尼那样的谦虚克制，所以从1927年开始，他再也没有任命新的秘书长。很明显，在法西斯政权下，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在控制着外交部。

1928年，墨索里尼和他的野心勃勃的副部长迪诺·格兰迪一起让大约20个资深外交官提前退了休，同时还改变了进入外交部的规矩以允许“征召法西斯”。^{**}这种对外交官的清除活动进行了多次（1932年又进行了一次），尤其是在1945年以后。这些活动让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在他整个执政期间要么是没有新意，要么就是赢得民族精英中大多数人的掌声。了解事情的前后关系是必要的，墨索里尼并不是第一个不任命外交部秘书长的人，克里斯皮在1888年也曾这么做过。自由党的部长们也没有完全退却，他们也在新的外交官中寻找他们自己的保护人，这些人也适度地坚持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信仰。1914年，意大利的外交活动已经带有很强的南部地主阶层的色彩，外交部中有相当多来自这一阶层的人。而年轻的外交官们可能更愿意赞成新的民族主义者联盟的观点，希望能够像变戏法似地出现一个更加强大的

* 据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说，这么做是格兰迪的主意。

——作者注

** 格兰迪在给图拉蒂的信中解释说，墨索里尼这么做是想让“战争英雄们”和“可信赖的法西斯”能够进入外交部。

——作者注

意大利。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必须屈服于外交部中的现实和习惯——在这样一个地方,太过明显地表现出热情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一种讨人嫌的行为。但是在1928年之后,这对于意大利的外交官来说却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现实。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就外交部里那些“征召的法西斯”而言,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太可能与那些从自由党时代就在外交部任职的同事的态度区分开来了。同样地,他们中很少有人支持后来的萨罗共和国,而且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在1945年之后继续在外交部门中任职。其中一个在1943年被选中的人是佛朗哥·法里纳奇,他是克雷莫纳法西斯头目法里纳奇的儿子,之前曾在类似汉堡和塞维利亚这些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接受的地方担任过副领事。^{*}他一直在意大利外交领域内任职,直到1973年才退休。

^{*} 佛朗哥·法里纳奇对轴心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持明显的悲观态度。

——作者注

另外一个有启示意义的例子是格兰迪。他在1929年9月被提拔为外交部长,并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到1932年7月。在那之后,他又担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直至1939年。^{**}尽管他的阶级背景让他可能受到尊敬,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分子。1921年墨索里尼打算与社会主义者和解的时候,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势力的领导人之一。他很早就主张解散国际联盟,声称它只不过是过于富裕的战争胜利者的一个联盟,另外,他还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然而,到了1922年的时候,格兰迪的世界观已经变得温和多了。他很容易就适应了自己的职务,并且把墨索里尼尊称为“一个有着几乎是超自然的本能的亲切的政治家”。他认为,领袖墨索里尼是“国家生活的综合体”,“他的现实

^{**} 20世纪80年代,德费利切学院的人在为格兰迪编辑论文集时还赞颂了当时年事已高的他。

——作者注

主义是永远正确的”。格兰迪英俊潇洒，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国际外交界是一个知名的、受重视和信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被诱惑的人。*

如果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里的人看起来还没有表现出完全违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的话，那么他们实际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有一些领域是法西斯特别感兴趣的，其中的许多方面也是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比如，像以前一样，意大利对东非及其周边的情况一直保持着警惕，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墨索里尼声明，在所有列强中，意大利在也门拥有最多的利益。他可能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在埃塞俄比亚获得更为直接的优势。但是，墨索里尼在之后并没有采取极端的行动，他还同意塔法里大公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并且两国还在1928年签署了一个友好条约。在这一地区，墨索里尼所采取的政策仍然是顺其自然。一个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外交官对一次为墨索里尼举行的欢送会仍然记忆犹新，会上尽是一些笑话和陈词滥调，会议结束时墨索里尼没有任何指示，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谈到修订国家的外交政策。

1931年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又成了意大利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起因是当时的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向格兰迪提出，意大利有可能在那里得到“补偿”。拉法埃利·瓜里利亚（此人在1943年7月之后担任了法西斯政权垮台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对赖伐尔的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评价。虽然瓜里利亚有着传统的背景，但他还是愿意想出一种方式，以便让“墨索里尼这一

* 墨索里尼也为格兰迪建立了秘密档案，并记录他在1929年的房地产交易中有腐败行为。

——作者注



海尔·塞拉西 (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1974年在位。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曾被迫流亡海外，1941年回国



皮埃尔·赖伐尔，法国政治家

代人”能够从民族的历史纪录中洗刷掉阿杜瓦之战的“污点”。他建议说，埃塞俄比亚是“仍然对我们开放着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惟一出路。要渗入透进这个国家，我们需要金钱；而如果想要获取它，那需要的可能就是战争了。但是，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和斗争，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我们想要成就帝权，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获取它的途径。”然而，他同时也警告说，当意大利在非洲采取行动时，意大利的领导人就不应当忘记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战略上的不祥之事是指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也就是说，德国接管了奥地利。为了阻止德国的进逼，瓜里利亚建议进一步改善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在就这些事情进行的所有的讨论中，墨索里尼都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只是被动地阅读一下官方的文件而已。埃塞俄比亚还没有重要到足以单独地引起他的兴趣的程度。

* 瓜里利亚在第二年又重复了他的建议。

——作者注

但是意大利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侵入非洲。在法西斯政权统治的前10年里，意大利面临的最为急迫的外交问题是与其东北面的新国家——后来被称为南斯拉夫的这个国家的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北约在这一地区的所作所为相比，当时法西斯的政策看起来还并不那么像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行为。墨索里尼虽然公开地批准了《拉帕洛条约》，但他从来都没有停止暗中干涉这个邻国的内政。意大利的外交官们并没有反对墨索里尼的阴谋诡计，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自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在1913年出现以来意大利自由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沿续。意大利为国王索古**提供的庇护也是满

** 索古政权的傀儡特性典型地表现在同意在发生战争时由意大利来指挥它的军队。

——作者注

怀着反对南斯拉夫的意图,而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为科索沃当地的“穆斯林”武装送去了经济援助和微笑。1926年10月,他又突然向巴多利奥提议说,意大利应当拟定一个全面入侵南斯拉夫的计划——这是不是墨索里尼凭他的“直觉”做出判断的又一例证呢?然而,尽管墨索里尼敦促说“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但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下文,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这样。

对于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来说,更具破坏性的做法是意大利对于克罗地亚分离主义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通过最终成为杀人害命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安特·帕韦利奇来实现的。当南斯拉夫(以及塞尔维亚)在1929年选择了更为独裁的政体时,意大利就在自己国内为克罗地亚的异见分子们提供庇护和军事培训。这些事都是在前民族主义者罗伯特·福尔热·达万扎蒂的协助下完成的,而意大利外交部也从自己的秘密资金中每月为他们划拨出7万里拉作为经费。1929年2月,帕韦利奇在与一个意大利人(但不是墨索里尼)谈话时提出了一个想法,即策划一次针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暗杀行动。但在当时,意大利人并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而格兰迪当时也自满地说,不能把克罗地亚人的这种热情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真正的“革命本质”混为一谈。总而言之,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意大利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坏邻居,但它还没有积极地策划意在让南斯拉夫彻底瓦解的阴谋。也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墨索里尼对这一地区的问题的态度最初是出自他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的态度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南斯拉夫问题不可避免地与伦比亚朱利亚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民族主义者也有关系,这些人主张摒弃或者清除居住在那里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墨索里尼很少违反意大利人的这些传统,1929年4月,他专横地命令的里雅斯特的地方官员,要他们确保在那些宣称是意大利的城市(但实际上多种语言通行)的大街上“没有斯拉夫的报纸”。

那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国际上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呢?独裁制度和后来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引发了有关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潜在空间的争论。对于外国人对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的迷恋,《法西斯评论》等其他刊物的撰稿人一直都非常留心。法国的乔治·瓦卢瓦和他的法西斯,西班牙的米格尔·普里莫·德里

* 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普里莫·德里韦拉这位西班牙将军对“墨索里尼所做出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价值的丰功伟绩”表达了赞美和敬意。

——作者注

** 巴斯蒂亚尼尼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即他们都把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

——作者注

韦拉和他的独裁政体，*奥地利的准军国主义，立陶宛的右翼分子，**日本、阿尔巴尼亚和英国（以及居住在意大利的亲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分子，甚至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也宣称要在立法中学习法西斯——所有这些人的行动在法西斯的刊物中都有所提及，以作为习惯上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明显的证据。有人相信法西斯分子的信息可以跨越国境，这种迷信居然流传得十分广泛。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也热情地解释说法西斯主义的先进之处在于，它相当于一种“通过伟大的意见交流和深刻的精神革命而实现的和平帝国主义”。然而，面对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膨胀主义现象，1928年3月，墨索里尼却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坚定地声明：“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

这一声明意味着什么？惟一明智的结论是，法西斯的普遍适用性对于大国的独裁统治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墨索里尼和其他的统治精英们都还丝毫没有定论。当墨索里尼声称法西斯主义只适用于意大利时，他的弟弟却宣称意大利政府的模式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特点。1928年3月，阿纳尔多宣称法西斯主义的普遍运用性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它源于战争，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乏味”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残暴”恰恰相反。阿纳尔多还资助了贝尔托·里奇，此人是一个有着哲学和激进倾向的年轻法西斯分子，渴望法西斯政权能够更进一步、更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帝国，并且渴望全世界都能够法西斯化。1931年1月，里奇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普遍性》的刊物来宣传他的理想。在之后的一年里，法西斯政权对